

金融学的范式

理论和方法: 历史考察与现实审视

姚 勇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越来越广泛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金融政策也已经成为一国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特别是近年来,由于许多国家、地区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造成发生危机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严重波动,有的甚至直接威胁了全球经济的健康稳定,因而对金融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显得越来越必要和紧迫。

长期以来,不同经济学流派依据各自的经济理论体系都对金融问题或多或少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但是,经济金融活动日益复杂,而且,由于金融活动或金融运行本身具有与一般经济不同的特殊性质,需要经济学对金融问题的研究以学科划分的方式体现这些特殊性质,即以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工具集对金融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和相对排他性的专业研究。这个学科就是金融学。

因此,金融学“以其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有别于经济学”。金融学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经济金融现实的需求,也是经济学研究分工细化的结果。但是,无论从理论体系本身的完整性还是从对金融现实的解说能力来看,金融学仍然还很不完备。特别是,相对于经济、金融近几十年来日益复杂的发展、变化,传统金融学更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经济学要想全面和有效地解释和解决金融问题,仅仅对传统的货币银行理论进行改良、补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学科重构。

本篇冗长的论文反映了笔者在这方面若干粗浅的思考。首先,金融学的重构是一场科学革命,因此我们从勾画一门科学的基本结构特征——理论、范式和方法,尝试指出了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和途径,目的是做一个基本的铺垫。其次,我们以理论创新、范式转换和方法变革为线索,顺序简要考察了经济学的演变历程。这是由于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至少目前仍是如此),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金融学学科的重构不可能忽略其与经济学的相互影响,也不可能脱离经济学的基本背景独立进行。最后,我们把金融学的发展纳入经济学理论创新、范式转换和方法变革的演变历程中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和现状的审视。因为尽管金融学本身仍不完善,但是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忽略这一过程我们不但无法深刻理解金融学的发展轨迹,从而从中发掘出有益的启示;而且如果不全面清醒地审视金融学的现状,我们就不能确定金融学学科重构的起点和基础,因而也就不能进行积极有效的“扬弃”。

一、科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

(一) 科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 基本涵义

我们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完整结构应该包括理论、范式和方法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门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独有特征。

1. 理论。理论是一门科学关于所考察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主观归纳和总结。科学的主体是人,客体是物——即客观对象。人通过对客观对象的感性观察,使客观对象进入人的思维,经过人的思维加工处理,从而归纳出关于客

观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意识结果。这些意识结果的最小构成单位是概念,概念之间经过合乎逻辑的联系形成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发展变化规律的判断和描述,这些判断、解释和描述系统地组织起来就进而上升为理论。

科学理论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具有客观真理性,二是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学理论的第一个基本特点与实践检验相联系,实践检验将一门科学对所考察客观对象的认识内容中的错误和主观因素尽可能地排除掉,从而使认识尽可能地接近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发展变化规律。科学理论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则与形式结构相联系,通过科学文本语言对概念、命题和原理等的有序表达和解说,使一门科学形成一个描述特定客观对象的完整体系结构。

科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决定了科学理论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解释,二是预言。

所谓解释,就是揭示存在事物的本质。理论是对现象本质的系统化反映,它通过全面分析在概念、命题和原理等反映着的现实的各种本质的联系,综合地再现所解释的客观对象。科学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因果解释、概率解释、结构解释、功能解释、起源解释等。理论解释提供了认识过去和现在,揭示已知事实的本质及从理论上解释和领悟它们的可能性。科学解释标志着人类的认识能力的大大深化。

除了解释之外,科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功能还在于预言。解释并非科学理论的唯一功能,如果科学认识只停留在对过去和现在的解释上面,只能说明已知的事实,而无法把科学理论当作人类自己行动的先导。科学预言提供了认识事物发展进程、预见最近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可能性。科学预言是依据一些规律性和本质联系,并按照一定的逻辑机制,从理论前提和先行条件中演绎出来的。预言从理论中逻辑地推导出未知事实的结论,这些事实或者已经存在但不为人所知,或者暂未存在,但应当和能够在将来产生。一个好的理论,必然会通过预言当理论提出时我们还不知道的现象来扩展我们的知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把握。

2. 范式。所谓范式,是指“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一门科学的范式,就是一门科学的研究者共同信仰和遵循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一系列关于这门科学所考察对象的根本属性的基本原理或基础假设,也包括这门科学的研究规则。

范式中的基本原理或基础假设具有公理性质,这些原理不可能再从更基本的原理中推演出来。例如在物理学中,“所有的运动或者是自然的或者是被迫的”,“所有的自然运动都是趋向自然位置的(如固体由于其本性而向地球中心运动)”,“被迫的运动是由于动因的不断作用而产生的(即超距离作用是不可能的)”以及“真空是不可能的”等就是一些基本原理或基础假设,物理学的所有真命题都要以这些基本理论或基础性假设作为证明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研究者首先是承认这些原理或假设,进而才在这些假设的前提下提出和发展理论。因此,范式实际上是一门科学的研究者所共同信仰的世界观。

范式中的研究规则包涵了这门科学独特的方法论准则,甚至也包涵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因而范式支配着一门科学的研究者的研究,成为研究的样板。一门科学的研究者的研究只有遵循该门科学的方法论准则,才可能与其他研究者进行同样语境下的交流,也才可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在该门科学中的地位。

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性,决定了范式一经形成将不但规范着一门科学的研究,而且还将在相当长的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范式的稳定时期,就是一门科学的常规研究时期。在这一时期,这门科学的理论内容和深度将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发展到范式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

3. 方法。方法是一门科学的研究工具。尽管范式中内在地包涵了方法,但作为抽象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方法仍然在一门科学中具有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地位。

关于方法的重要性,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我们的发明是这样的,它给天赋的敏锐和才能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东西,而方法几乎就等于天赋。就像为了划一条直线或描出一个理想的圆周,如果只是用手的话,手的果断、技巧和有效性的关系就很大;如果使用圆规和直尺,那么手就不大起作用或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我们的方法问题。”培根的这番决断也许过于极端,但方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错误的方法肯定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理论结论,而有效的方法则对有效的理论的形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方法的相对独立性,其原因在于:第一,一门科学的方法是一个多种方法的集合,针对不同问题,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优势;第二,一门科学中有些方法本身是另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些方法受另一门科学的影响要比本门科学范式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且其发展往往还要取决于研究这些方法的学科的发展;第三,一门科学中有些方法可能是许多门科学通用的,并不唯一地运用于本门科学。

此外,一门科学的方法是多种方法的集合,同一范式内可以有层次相同或不同的多种分析方法,同一种方法也可能被不同的范式所运用。关键在于,这种方法对这一范式而言是否是关键,影响是否是最重要的。

(二) 理论、范式和方法的相互关系

理论、范式和方法展示了一门科学一定时期的全貌。但是,在一门科学中,理论、范式和方法决非简单的并列和加总,它们之间存在着静态层次分布和动态演进差异的复杂关系。

1. 理论、范式和方法的层次分布。一门科学从“前科学”发展到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提高的结果,它标志着人类对该门科学所考察的客观对象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认识。这种系统化的认识从一门科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三个方面完整地表现出来,即一门科学的形成意味着该门科学的理论相对成体系、范式相对稳定和方法相对成熟。

一门科学形成之后,虽然从总的趋势上看还会进一步地发展变化,但这种发展变化往往是渐进的,而非每每通过“革命”来实现。即使是“革命”,“革命”的酝酿实际上也是长期的。因此,一门科学发展过程的主体是一个个由“革命”联结起来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所谓的常规研究时期。

观察一门业已存在并处于常规研究时期的科学,构成该门科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呈现出高低不同的层次分布态势,并且居于不同层次的理论、范式和方法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联结起来。

首先,范式居于一门科学完整结构的基础层次,占据着统领全局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质。作为一门科学的世界观,范式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程度,因而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决定了该门科学考察和研究其特定客观对象的出发点,也决定了该门科学理论发展方向的可能选择。按照范式的指导和规范,一门科学的研究者们陆续提出关于该门科学所考察对象的概念、命题、原理等,并逐渐发展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科学的方法论,范式预先决定了进行该门科学研究的抽象的方法准则,进而又决

定了研究者所使用的可行的具体方法。一门科学的概念、命题、原理以至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依照范式所容纳的方法论准则并运用相应的具体方法实现的。因此,理论和方法总是“收敛”于范式的,探寻一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是可以最终从这门科学的范式那里找到它们产生的根源。

其次,理论是一门科学的最终层次。科学的最终目的或功能能是解释和预言,范式作为抽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可能实现这些目的或发挥这些功能,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是直接为理论服务的,也不可能实现这些目的或发挥这些功能,科学的解释和预言都要依赖于理论。因此,理论是范式和方法的归宿,从而最终也是一门科学的归宿。

第三,方法是范式和理论之间的中间层次。如前所述,范式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原则不可能直接发挥科学的解释功能和预言功能;同样,理论发展得再充分再高深也不可能代替范式本身。范式与理论之间的这种“距离”正是依靠方法联系起来的。作为基础性的假设和研究规则,范式不但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设定了轨道,而且也将一定程度上决定理论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方法是范式规则的具体运用,一门科学的研究者选择方法时不能违反范式规则。理论与方法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理论对适应于其自身特点的方法提出特定的需求,即一种理论的特点决定了推导或发展这种理论需要运用的特定方法。另一方面,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往往也将决定得出什么样的理论结构。这样,通过方法,理论的形成及功能发挥得以贯彻范式规则。因此,方法是联系范式和理论之间的桥梁。

应该指出的是,理论、范式和方法的这种不同层次分布表现了三者在一门科学的结构中的相对地位,并不绝对地意味着谁比谁更重要、更突出。事实上,三者在最根本的联系上是相互依存的,范式不可能脱离理论和方法而独立存在,理论必须使用方法,其背后不可能没有范式,而不遵循范式、不针对理论的方法显然也没有意义。

2. 理论、范式和方法的演进差异。理论、范式和方法在一门科学的静态结构中表现出如上的层次分布,从而展示出一门科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的统一性。同时,一门科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一个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并且由于理论、范式和方法各自具有的不同特点而表现出动态的演进差异。

理论、范式和方法的演进差异在于理论、范式和方法各自发展的非同步性。与理论和方法相比较,范式是一门科学的“核”,具有最为稳定的特性。相反,经常性地对旧概念、命题和原理的补充和修正,经常性地提出新的假说并得到现实的验证,使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都处于日新月异的状态。理论的日新月异整体上推动与理论更新相适应,或者方法从简陋趋于完善,或者淘汰一些不适宜的方法,或者从其他学科、其他领域引入新的方法,从而在一门科学方法库中内容也不断丰富、不断变化。方法和理论的这种相对易变性对任何一门科学而言都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由于范式的支配和规范作用,理论和范式的变动不仅仍然大部分被局限在范式之内,是范式内的变化,而那些违反范式的理论和方法一定会被斥为“异端”并为遵循范式的“正统”所不容。

(三) 科学革命与理论创新、范式转换及方法变革

如前所述,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常规研究阶段是主体,而科学革命则联结了每一个常规研究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革命是不重要的。相反,从科学发展史来看,每一次科学革命都是一次从一个较低层次的常规研究阶段向另一个较高层次的常规研究阶段的飞跃,都是科学本身质的升华。

1. 科学革命的动因。一门科学为什么不能始终通过渐进式的常规发展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常规发展阶段的尽头都会产生飞跃式的科学革命?显然,这是由客观世界的绝对运动特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绝对有限性与范式的相对稳定性之间内在的矛盾对立造成的。

一门科学相对稳定的范式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一阶段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总体把握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历史性总结。从这个既定的总体把握和认识出发,理论和方法在与这个既定的总体把握和认识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不断产生和发展。此即一门科学的所谓常规研究阶段。一门科学常规研究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该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不断发展更新,但总是遵循着范式的规范,是在范式规范之内的发展和更新。在这个阶段,不同研究者的理论观点可能有所不同甚至对立,研究技术方法也可能有所差异,但是这些不同、对立或差异背后却有着共同的范式基础,因此这些不同、对立或差异并非根本性的,而是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对立和差异。

然而,客观世界的绝对运动特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绝对有限性使一种范式一旦形成就陷入了内在的矛盾之中:范式的相对稳定使其往往不能及时跟上客观世界运动变化和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的步伐,因而在此范式之内的理论和方法经过充分发展之后最终也将表现出对解释和预言客观世界捉襟见肘的困境。换言之,范式的滞后最终将导致理论和方法的滞后。

理论和方法不能有效地解释和预言客观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就对既定本身提出了挑战。因此,一门科学表面上的理论危机或方法危机实际上反映了这门科学的范式危机。在这个处于危机的范式之中,理论和方法都发展到了范式的边缘而亟待突破。此刻,少数研究者注意到既定范式对理论和方法发展的束缚,因此提出某些超越既定范式的新理论或引入某些超越既定范式的新方法,试图寻找可能的出路。然而,范式的稳定具有强大的惯性,任何对既定范式的突破都将遭到大多数范式遵循者的非议和反抗,少数寻求突破的研究者也会由于自身曾长期遵守既定范式而遇到多方面的障碍。但是无论如何,一门科学的范式危机充分表明,这门科学已经到了革命的前夜。

2. 理论创新、范式转换和方法变革。从一门科学的整个发展史来看,相对于常规发展阶段,虽然科学革命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瞬间的飞跃,但是实际上一次科学革命也必然要经历革命与反革命的长期较量,这种较量将全方位地、程度不同地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三者之间展开。

(1) 理论创新。所谓理论创新,并非指任何意义上的新旧理论替代和更迭,而是特指一种或多种超越既定范式规则的新理论的提出。理论创新之所以并非指任何意义上的新旧理论替代和更迭,是由于即使在既定的范式之内也存在新理论对旧理论的替代和更迭,然而这种替代和更迭是基于同一个范式的,因此本质上是统一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在于超越既定范式,在于理论建立和发展所依赖的不同世界观和方法论。

理论创新最初是在传统理论危机的压力下通过局部地突破既定范式而展开的。也就是说,理论创新虽然是对既定范式的突破,但最初并不绝对地依赖于一个完整的新范式。由于理论创新遵循了与既定范式所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理论创新往往与传统的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表现出强烈的不兼容,从而形成与传统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的尖锐对立,并受到传统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拥护者的排斥和反对。只有理论创新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其能够比传统理论更有效地解释和预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理论创新才能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理论创新进而由局部向总体发展,同时随之逐渐完善和确立其所依赖的新范式的统治地位,并最终形成遵循新范式的新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

当然,理论创新并不意味着对整个传统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的全面否定和摒弃,而是有继承有发展也有否定的“扬弃”,因而新的理论体系中必然会包涵传统理论的合理内容。

(2) 范式转换。所谓范式转换,是指补充、修正或推翻既定范式从而形成新范式的过程。科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系统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开始,其前提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基本看法。如果这种基本看法完全不符合实际,就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所承认和接受,也就不可能成为范式而在一门科学中占据核心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范式就是不可动摇、不再发展的

绝对真理或终极真理。范式是一种相对真理,一定时期的范式代表了这个时期人的认识能力的高度,随着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也会对既定范式形成正反馈,推动范式一次又一次地转换,从而逐渐向绝对真理或终极真理无限地接近。

基于范式在一门科学的结构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从逻辑上说,范式转换也应该是科学革命的前提,但实际上往往并非如此。如前所述,范式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使范式成为一门科学中最稳定的部分。科学革命也因此在既定范式面前遭到最激烈的反抗,新范式的确立最终需要通过理论创新的边缘突破来反证,即新范式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将取决于超越既定范式的理论创新是否更好地解释和预言了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

因此,范式转换是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科学革命不一定从范式转换开始,但一定是以范式转换结束的。

(3) 方法变革。所谓方法变革,与理论创新类似,是指一种或多种超越既定范式的新方法的引入和使用。作为范式与理论的中间环节,一门科学的方法受到范式的严格束缚和理论的深刻影响。一种方法能否被一门科学的研究者所接受和使用,取决于这种方法是否贯彻了范式规则,以及是否有效地推动了理论的进步。但是,也正是由于方法是联系范式和理论的中间环节,就同时预留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引入超越既定范式的新方法而反作用于范式和理论,从而推动理论创新和既定范式的转换。

在科学发展史上,由于一种新方法的运用而极大地改变一门科学的面貌甚至引发科学革命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这是因为,一种新方法的运用可能使研究者的观察视野扩展到从前不能达到的范围;或者这种方法的出现及时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与原来的方法相比它能够更准确、更方便、更深刻地描述和揭示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属性和运动规律。

总之,一门科学经过一个常规研究阶段的长期充分发展,先前形成的范式必将通过理论和方法的停滞不前表现出“范式危机”。“范式危机”时期,由于范式作为一门科学的“硬核”具有强大的惯性,因此阻碍科学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超越既定范式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将能够形成边缘性的突破,从而最终推动一种反映了客观世界新变化和适应该门科学继续发展的新范式的形成。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是科学革命的前奏,科学革命的最终胜利还有赖于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基础上的范式转换过程的全面完成。

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范式转换和方法变革

尽管到最近还有人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存在疑虑,但是纵观经济学二、三百年的演进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象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内容的丰富和深化,经济学流派的兴衰和更替,正是上述理论创新、范式转换及分析方法变革的复杂动态过程。

(一) 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

16到17世纪兴起并盛行的重商主义是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起点。当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贸易与殖民地开拓不断扩大,西欧封建制度日渐衰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渐成长。与此相联系,重商主义认为,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他们有权统治和干预经济。另一方面,重商主义认为国家财富的关键是金银,输入金银可以增加财富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重商主义形成了出口垄断、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的理论体系。

可见,重商主义主要是一种集中于供给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其理论归宿是封建君主权力的维护以及国家财富的增长,因此为封建君主服务和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导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范式。在此范式之下,重商主义的理论必然就是牺牲消费者利益而有利于生产者的。同时,作为早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重商主义不但在理论上粗陋浅显,而且在方法上也只是简单的演绎逻辑和语言论述,以至重商主义者们的理论表达如同今日贩夫走卒们对社会经济的牢骚抱怨一样随意和散漫。

经济生活的实践证明,重商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并不能带来经济繁荣和国富民强,反而造成生产力下降、经济凋敝。因此,也就预示了即将发生的经济学革命。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国富论》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重商主义的反叛,并且这种反叛是从范式、理论和方法三个层次上展开的。

首先,亚当·斯密通过理性经济人、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

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性经济人。亚当·斯密认为,人是理性的,是图谋自我利益的,理性的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提高。理性经济人确立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追求个体利益的人,因而也应确立了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基本认识。作为经济学家观察和思考社会经济现象的世界观,虽然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也曾受到许多质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它仍然是各派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

从理性经济人出发,亚当·斯密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这一思想为今后的经济学发展奠定了两个紧密联系的基础:一是市场自动出清;二是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提出,不但确立了自由市场机制是社会经济的有效组织方式,而且也使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供给转向需求,经济活动的目的不再只是增进以君主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的财富,而是各个社会成员福利的提高。因此,自由市场机制也成为“人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在经济学中贯彻的体现。

同时,亚当·斯密还第一次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从而明确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不但批判了重商主义所持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也初次尝试解决价值来源和形成这一基本经济问题。价值来源和形成问题是任何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础,因此构成了经济学范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价值来源和形成的判断成为以后经济学演进的重要线索。

其次,在理论方面,亚当·斯密针对重商主义提出了分工和储蓄—投资理论。亚当·斯密认为,要增加国民财富和生产,一是要依赖于分工,因为分工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要依赖个人的节俭,因为节俭可以增加储蓄,形成投资,扩大资本积累。此外,亚当·斯密还具体展开论述了其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让自由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去充分发挥作用。由此,亚当·斯密并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第三,尽管亚当·斯密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范式、理论上形成了对重商主义的革命,但是在方法上它与重商主义又保持了明显的牵连和继承。亚当·斯密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力图从各方面全面地说明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它的方法仍然主要是依赖于直觉和表面观察的抽象演绎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的全面关注。虽然,亚当·斯密本人也进行了一些微观经济分析,如在论述分工理论时;其后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偶尔使用了简单的数理推导和证明,如李嘉图在论述比较利益理论时,不过总的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仍然以抽象演绎为主,缺少实证分析。

总之,亚当·斯密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正式开始了其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的系统演进过程。

(二) 古典政治经济学危机、边际主义革命与新古典经济学

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使经济学第一次具备了理论、范式和方法的完整结构。但是,就其范式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明显地具有全面但笼统的特征。因此,亚当·斯密以及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往往总是力图从各方面全面地说

明经济现象,但是由于其理论更多地是建立在直觉上的,当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探究经济现象背后的更本质的关系时,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从而往往将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发生概念的混淆和逻辑的矛盾。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到了19世纪其局限性已经非常明显,并逐渐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危机。

面对危机,一些经济学家逐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全面的但是直觉而笼统的理论结构中分裂出去,分别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这一整体的某一方面,进行更深入详尽的分析研究,力图从特殊到一般地来说明整个经济现象。其中,对经济学的发展最有影响的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革命。

1870年瓦尔拉斯、杰文斯和门格尔几乎同时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边际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劳动的消耗量,而是取决于主观评价。这样,首先在价值形成和来源的层次上边际主义者就已经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传统范式的重要转换。

在边际价值论的基础上,边际主义者运用边际效用、边际生产力等概念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法。边际主义者指出,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资源的稀缺性有关,资源的稀缺性使人们对市场上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估价边际递减,即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是主观评价的结果。因此,分析经济问题就不能离开供求分析基础上的边际分析。边际分析既是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的变革,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也是边际主义者对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转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此外,边际主义者认为,各经济主体(个人、厂商等)都受理性行为的原则支配,在既定资源约束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对此问题的分析,就是边际主义者创立的微观经济分析方法。

新的分析方法推动了新的理论体系建立,这就是最终以马歇尔为集大成者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边际主义的整合。在范式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既接受了边际主义者以边际价值论、边际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对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改造,又保留了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既有的理性经济人、自由市场机制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在理论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以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构成的一整套微观经济理论模型和理论结构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在方法方面,由于边际概念的引入,几何图示、代数推导乃至更为高深的微积分等数学方法开始逐渐应用于经济分析的领域,大大增强了经济分析的可靠性和说服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时期,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上达到了最高峰。新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灵活调整的价格、完全竞争等范式基础,使其得出市场能够通过价格的指引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结论。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反过来仍然坚持自由放任的信念,反对国家干预。不过,这种信念很快就受到了挑战。

(三) 凯恩斯革命

20世纪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在摧毁各国经济的同时也破除了“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神话。1936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因之成为经济学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直接引发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建立了新经济学的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深刻影响了它所占据主流地位的那个时代。

凯恩斯革命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动,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虽然这种冲击往往是通过理论的创新或方法的变革表现出来的。

首先,凯恩斯革命发生本身表明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缺少的实证精神。如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抽象演绎,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对之加以继承。到凯恩斯革命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形式上已经极其精致,逻辑也非常完美,但是面对2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古典经济

学却表现得极其苍白无力。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单纯的抽象演绎有直接的关联。抽象演绎法只从几个基本的、公理性的假设出发分析经济问题,就潜藏着逻辑正确但与现实不符的可能性。凯恩斯正是从20、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现实出发,以古典经济学默认的几个基本的、公理性的假设为起点,开始了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新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凯恩斯的这种经济分析的实证精神深刻影响了以后的经济学发展。1932年,L·罗宾斯发表了被称为是20世纪中重要、被引证最广泛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其中,罗宾斯指出,经济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应是从普通的常识经验中就能直接概括出来的一些基本命题:由于这些命题比个别的经验事实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从而保证了逻辑演绎方向和结论的“可用性”;而应用理论的时候,则需要有更多的附加假定,因为理论的可应用性是依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定的。这实际上就是强调经济学的方法论应该是抽象演绎和实证检验的有机结合。1938年,T·哈奇逊出版了《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进一步把逻辑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分析。从此,经济学成为一门实证的科学。

其次,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核心——“有效需求”原理就是直接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提出的,实际上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特别是萨伊定律和完全竞争)的否定。只不过,这种否定不是完全的,而是部分的。因为,按照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原则,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长期内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凯恩斯则认为,由于边际消费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经济往往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经常地是非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在凯恩斯那里,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是有条件的和有保留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部分否定,凯恩斯经济学也得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结论,那就是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和政策。

第三,凯恩斯经济学关注的重心重新回到了重商主义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它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经济学关注与经济中的总量——总产量或国民收入总量、总消费、总支出、总投资、总就业水平等相关的行为活动,强调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为了把就业、收入理论和利息、货币、消费、储蓄与投资理论纳入宏观经济理论结构,凯恩斯经济学还破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把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分析的 inconsistency。直到今天,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仍然是宏观经济学的最主要方法。

此外,凯恩斯经济学在预期、不确定性等方面的创见也随着其日益融入新的经济学范式而深刻影响了以后经济学的发展。

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许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建经济和促进增长的理论圭臬。与此同时,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除了继续诠释和发展凯恩斯经济理论之外,还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显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新的困惑和矛盾。

(四) 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

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滞胀”不但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广受责难,凯恩斯经济学也遭到了全面的质疑。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供给学派随之崛起。它们通过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部分地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主张摒弃国家干预,推行经济自由化。

1. 货币主义。货币主义的兴起,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凯恩斯主义不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滞胀”,因此货币主义某种程度上取代凯恩斯主义与其说是一次经济学的自我更新,还不

如说是一场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货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定,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凯恩斯所说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所决定的总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经济的货币方面受到了扰乱。在货币主义看来,“货币最要紧”,货币因素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等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

反凯恩斯主义的迫切任务促使货币主义在理论上走向唯货币至上的极端,但是在经济学的范式方面,货币主义的成果则乏善可陈。货币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柱,不过是掺进现代内容后重新表述了的货币数量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理论一度也曾被落实为政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但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从而自80年代以后就从经济学显赫的主流位置上销声匿迹了。另一方面,货币主义重新强调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出清或均衡,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是妨碍市场自动出清或均衡的主要根源。这样,货币主义实际上在范式方面重返了新古典经济学。

尽管如此,货币主义的出现实际上并不是偶然的。货币主义极端重视经济中的货币,丰富和扩大了货币需求函数,拓展了货币影响经济的机制等等,是战后以来货币及其金融活动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的反映或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主义“货币最重要”的信念及其基础上的理论和分析方法,都促使经济学以密切联系实际的精神紧跟经济现实的变化发展。1953年,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发展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把预测效果作为检验理论假设的根本标准,指出“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一种‘理论’或一种‘假设’;从中可以产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的有意义的预测”;以及科学是“一组实质性的假设,而构造这些假设的目的是为了抽象出复杂现实的主要特征。”此外,弗里德曼还特别强调了波普的否定论在经济学中的意义,认为经验事实永远只能否定假设,而不可能证实假设。这样,弗里德曼就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

2. 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中,供给是主要的方面,并坚决主张自由放任,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经济,主张减税、减支,以促进供给增加。

供给学派的思想 and 理论是直接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也是针对“滞胀”的药方之一。但是,就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供给学派在范式、理论和方法上都无任何新意,而不过是简单地重拾亚当·斯密及其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信念和“萨伊定律”而已。

(五)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

1.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称理性预期学派,因为在向新古典经济学的回归方面,理性预期学派比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走得更远。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用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假设:(1)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2)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3)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在系统性的误差。

运用上述假设,卢卡斯、萨金特等人提出了一个新古典宏观模型——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货币对产量和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因素是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货币供给的冲击——即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引起经济波动。

但是,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并没有解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的一个理论难点或悖论,即如何解释市场自动、连续出清与非均衡的经济周期的不一致。为此,罗伯特·巴罗、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芬恩·基德兰德等人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认为货币对产量没有重要影响,引起经济波动的不是货币因素,而是实际因素,即产量的变化引起货币存量的变化,而不是相反。产量增加时,金融体系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发行更多的货币,因

此货币数量是适应产量的变化而调整的。

总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恢复”或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意外冲击(货币、技术等)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不变性命题”(invariance proposition),即所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都无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和理论更精确的重新表达,是在分析方法上普遍运用高深的数学工具,而对预期的极端重视则使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成为一种动态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凯恩斯主义的比较静态方法相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宏观动态分析是经济学的一大进步。

2. 新凯恩斯主义。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挑战,新凯恩斯主义发展起来。进入9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自由化在提高经济效率和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困扰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新难题,这些难题显然并非自由市场所能解决,因而成全了旧凯恩斯经济学在新形势下以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和理论结论的复兴。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真正未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数学上的构想。因此,新凯恩斯主义力求成为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实际政策模式,而非一种抽象的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引入粘性价格的关键假设,认为名义变量(如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但是,新凯恩斯主义只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极端进行了修正,而不是完全否定。在某些方面,新凯恩斯主义还作出了根本性的妥协。比如,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的模型都接受和采纳理性预期的假设,或者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以图补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是,这样的结合和补充恰恰背离了凯恩斯革命的重要部分。正如琼·罗宾逊夫人指出的那样,凯恩斯革命“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和惯例为基础决策问题的转变”;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经济生活的很大部分都是根据公认惯例来处理的”。可见,新凯恩斯主义将理性预期纳入理论体系从而用理性经济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质上是向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及凯恩斯革命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让步和复归。

3. 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并不是最近的事,但是,在最近显得尤为突出。

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它的前身——19世纪末凡勃伦、康芒斯等创立和发展的制度经济学不同,前者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范式(主要是历史主义)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而后者则完全沿用和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等,可见新制度经济学从来都不是游离于正统或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异端,它与其他理论体系的不同只在于,它是在新古典的范式里重新研究和估价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将传统理论设定为已知不变的参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经济组织等视为亟待解决的关键性变量,并侧重研究效率的性质和结果如何与这些变量相联系。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以产权、经济组织和制度变迁理论去考察经济问题,这就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因而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经济学范式的扩展和更新。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范式内发展起来的,但是它的某些理论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着力探讨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等等,都潜在地否定着新古典的市场完全性假设。

以上,我们按照时间序列顺次选取了当时所谓的正统或主流经济学,考察其通过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实现的经济学的演进过程。但是,这并不表明其他经济学流派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就是无足轻重的。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学能够占据主流或正统地位,除了它在范式、理论和方法纵向上的前进之外,也必是由于其横向上的兼收并蓄,或曰“综合”。

从最近一二十年来看,经济学发展再次进入了一个经济学流派纷呈的“战国”时代,各种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层出不穷,它们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但是各种思想、理论和方面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因而客观上迫切需要新的综合,而新的综合也必然将酝酿新的统一的经济学范式、理论和方法的产生。

三、金融学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反思

如上所述,理论创新、范式转换和方法变革推动着经济学的演变,而金融学的发展也莫不如此。

(一) 否定之否定: 金融学发展的历史性回顾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的发展内含于经济学的上述发展轨迹之中,它与一般经济理论一样,亦在一次又一次经验事实的检验和冲击下,不断地通过一个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实现着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其中也必然包括了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分析方法的变革。

在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上的较早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金融活动局限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较小的范围之内,同时由于功能还只是“一般的中介人”;因而其影响也是有限的。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金融也随之迅速发展,遍布城乡的金融机构、不断繁荣的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等等,使金融渗透到几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进一步迅速发展,70、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迅猛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此背景下,金融不但功能更加丰富,对社会经济的渗透更加深入,成为所谓“万能的垄断者”;而且金融本身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今天,日均2.5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和更多数额的证券交易、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等,已经使金融在全球和各国外汇市场、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商品市场等的支撑下,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虚拟”经济。

金融学的发展,正是在上述金融发展历程的背后展开的,而且金融学的发展也明显受到各个时期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的约束和影响。

(1) 早期的简单金融活动决定了金融学的简陋。货币的出现以及建立在货币运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最初就是为了降低经济活动中交易成本,因而这一时期,金融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异地汇兑、小规模的分存款等活动而成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因此,当时所谓的金融学主要是围绕着对货币问题的探讨,如纯理论上对货币本质、货币的价值决定等问题的探讨,以及结合现实对银行发行银行券数量的研究等等。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时期,是金属本位货币时期。金融货币本位的特性,使关于货币本质和货币价值的决定问题内在化、有机地嵌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货币是执行特殊职能的商品,是便利交换的一般媒介;货币与其他商品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本质,而在于它们的功能。由于货币也是商品,因此货币的价值也决定于生产货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货币与一般商品具有共同的价值决定基础,货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就通过货币的增减变动表现为一种自动的调节机制(休谟的现金—铸币—流动机制)。

边际革命使货币的名目主义本质观找到了形式更完美的理论依据,货币的价值决定也由劳动价值论基础转换到边际价值论。确立货币的价值由对货币的主观评价决定后,就使货币仅仅成为一种表征经济的符号,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金融活动自然也只是一种符号经济,其作用只能是辅助性的、工具性的

和表面性的,而且金融活动对整个自由市场的自动出清或均衡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新古典经济学为了解决经济分析中如何处理货币的问题,产生了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即费雪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古典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中性”,因而在经济分析中排除了货币对经济的实质性影响,从而在把货币与经济孤立出来的同时把金融学也从一般经济理论中孤立出来。由此,金融学与一般经济理论互为前提,相互隔离。屏蔽货币对经济的实质性影响之后,新古典经济学沉湎于没有货币的供求均衡分析真空中,金融学也只局限在探讨简单的技术层面的微观金融活动的小圈子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以及货币供给弹性很小的金本位通货制度下,建立在货币中性基础上一般经济理论和金融学的分立有其表面上的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金融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不但一般经济理论,而且金融学也逐渐远离了经济现实基础,难以有效反映和解释经济运行。正因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既宣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破产,同时也宣告了当时金融学的破产。

(2) 凯恩斯用有效需求原理取代了古典的“萨伊定律”,从而完成了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并且通过重新认识货币对经济的作用从根本上完成了对新古典金融学的革命。凯恩斯认为,利率不是古典经济学认为是由资本市场的供求决定的,而是由货币市场的供求,即货币的需求和供给而决定的。由于投资是利率的函数,因而经济就将通过利率而受到由数量的影响,从而否认了“货币中性”。特别是,凯恩斯通过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三大规律之一——流动偏好规律表明,经济主体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是自由市场机制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从而货币以及金融活动对经济的作用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识深刻得多。

否认“货币中性”使金融学挣脱了传统范式束缚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国内金融体系、金融活动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金融学也必须适应新的现实问题的考验。因此,这一时期,金融学从关注货币问题转到更多地关注金融自身运行及其对经济的作用机制上,从而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现代货币金融体系的构筑,其核心是研究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进而研究货币供求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就业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例如格利和肖的“内生金融”理论、歌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麦金农的金融发展理论等等,他们都认为金融与经济是有机结合、互相影响和紧密相关的,并对传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重要补充,即金融是除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之外的又一个关键性的经济增长要素;与此同时,主流经济学也大多把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作为自身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和约束条件,希克斯更把包含货币、金融影响的IS-LM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学,成为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从而确立了金融因素在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金融学也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货币中性范式的惯性作用,使货币非中性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认同和接受。早在50年代,密尔顿·弗里德曼就发表了《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一文,对货币非中性提出质疑,试图重新建立宏观经济的货币数量论研究方法。6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帕廷金在其代表作《货币、利息与价格》中虽然在分析方法上抛弃了以货币中性的两分法,但最终还是得出了货币数量论的传统结论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成立的结论。帕廷金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即所谓的“帕廷金论战”。范式、理论和方法的多重交叉及混合,使“帕廷金论战”最终也没有真正澄清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从而制约了金融学的进一步演进。

(3) 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遭到质疑。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为代表的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他们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同时,以变化了形式的现代货币数量论重新得出了“货币中性”的

结论,从而使金融学的发展再次套上了枷锁。无视日益复杂的货币运动以及组织、承载货币运动的金融对经济的全面、深入渗透和影响,使金融学重新偏离了对现实经济整体性、宏观性反映和解释。迫使其一方面走向微观,发展出公司财务理论、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定价和交易理论等等;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倒闭频繁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波动,金融学亦在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和主张,但大多以操作性的、技术层面的政策措施为终结,缺乏适应不断变化的金融内外部运行环境和特征的灵活性。应该说,金融学的这些新成果也是非常有益的,如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对资本市场的微观操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等等。然而,复归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必然导致人为地割裂金融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不但降低了金融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也促使金融学的发展面临范式脱离实际的内在冲突。

(二) 现状与矛盾: 当代金融学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与经济的迅猛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适应,各国金融体系日趋庞大,金融结构日趋复杂,金融资产规模成几何级数飞快扩张,从而金融活动日渐成为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另一方面,受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起普遍开始逐渐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从而掀起了一股与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配合、相互推动的巨大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潮流。这股潮流至今方兴未艾,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经济、金融运行环境和金融本身的巨大变化,为金融学的新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客观上也同时要求金融学应该及时反馈和解释这些变化,并通过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体系,为经济、金融的健康稳定服务。但是实践表明,当代金融学在面临这些现实变化时缺少及时有效的应对能力,特别是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地区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而当代金融学在危机前和危机后更加明显表现出捉襟见肘、苍白无力。缺乏解释和预言能力的理论是空洞的、无生命的理论,因此可以说,当代金融学本身实际上是处于危机中的。

当代金融学何以至此呢?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对当代金融学的范式、理论和方法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反思。

1. 当代金融学的危机最根本是范式危机。从以上对经济学发展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每一次完整地包含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的革命是比以前一次更快的加速进行的。换言之,经济学的常规研究阶段越来越短,经济学范式、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更新越来越快。出现这种趋势,固然与经济实践的迅速发展变化紧密相关,但更是由于经济学知识体系积累的日渐丰厚以及建立在各门科学日渐发展基础上的人的认识能力的加速提高。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由于金融活动的简单,金融学也就是简陋的,甚至严格来说是毫无体系的。凯恩斯的《通论》以及随后的发展,不但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而且也由其较为完整的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方法集合为当代金融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只不过由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的时代,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金融问题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而且当时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也并未对金融学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凯恩斯主义时代金融学虽然在货币理论和货币经济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从整体上来说,金融学仍然是不完整和不成熟的。对“滞胀”问题束手无策以及被认为是“滞胀”问题的根源,使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也使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迅速崛起并相继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除了少部分补充添加(如理性预期假设)之外,大体都是重拾新古典的自由放任范式基础,因此获得了“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的高速度。但是,一方面正是由

于这种革命的高速度,使金融学突然面临多重范式选择而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由于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范式并无多少新内容,使金融学不得不面临经济金融现实日新月异而范式基础“复古”的尴尬境地。

近年来,经过实践的检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陆续从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上跌落下来,其统治时间之短,还不足以作为当代金融学在一个稳定的范式基础下成长起来。而理性预期学派则在众多支持者的努力下通过将理性预期假设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基础而建立了一整套理论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此同时,面对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供给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另一些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综合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正、补充和整合,发展出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并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形成对峙之势。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因此它们的对峙不但没有改变复杂、动荡的经济学范式转换背景,造成当代金融学整体上的分裂,而且由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范式都有各自的严重缺陷,从而导致以它们为基础的当代金融学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

简单而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范式的严重缺陷及其造成当代金融学范式基础处于困境的主要表现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自由放任范式自身的矛盾。理性经济人、连续的自动的市场出清,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前提之一,因而自由放任既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又是其理论归宿。这首先就是自相矛盾的。再者,就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支持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来说,也是如此。金融自由化理论证明,解除国家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管制,就能够提高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金融自由化的极限在哪里?理性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金融自由化条件下金融活动主体的理性行为一定能够实现连续的自动的市场出清吗?金融活动具有与其他经济活动相似但又大得多正的或负的外部性,存在保证金融活动的个体理性集合后形成集体理性从而确保金融始终保持正的外部性大于负的外部性的机制吗?事实上,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金融自由化在提高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不可避免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形成严重威胁,甚至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倒退。

第二,新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范式自身的矛盾。缺乏微观基础,是“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为此,新凯恩斯主义试图“用建立在市场始终出清和经济行为者始终实现最优化的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6]。新凯恩斯主义重建凯恩斯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努力还包括确定由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导致的粘性价格——不完全市场假设。通过这一假设,新凯恩斯主义最后得出与“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相同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结论——国家干预。但是,我们注意到,始终市场出清和经济行为者始终实现最优(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假设相同而不是相反,而同时粘性价格假设暗示新凯恩斯主义仍然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的,因为“两分法”的前提是价格完全具有弹性。但是,市场始终出清又是价格完全具有弹性的结果,粘性价格——不完全市场假设如何与市场始终出清相容?在此悖论之下,当代金融学的范式基础不可能是稳固的。

第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矛盾。首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理性预期的假设得出了货币中性的结论,实际上也就在方法论上恢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而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理性预期假设,因此尽管它得出的观点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很大差别,但是在货币中性及“两分法”问题上,新凯恩斯主义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其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某种程度上背弃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理论文

献普遍运用了艰深的数学模型,并大量采用计量经济模型验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然而现实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显然是有限的。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仅具有形式上的精致和美感。新凯恩斯主义则宣称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绝未想要成为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要成为解决真实世界现实问题的政策模式”^[7],但是实际上“新凯恩斯主义文献一直大量地偏向于理论上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对新凯恩斯主义缺乏以经验为基础的著作提出了批评。例如费尔(R. Fair)认为,“新凯恩斯主义文献已使宏观经济学脱离其经济计量基础,并建议新凯恩斯主义者‘考虑汇合他们的各种理念的可能性并提出可检验的结构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莱德勒(D. W. Laidler)也有力地论证要恢复经验证据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8]。显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倒退倾向也不可能对当代金融学有积极的影响。

2. 当代金融学的理论体系仍然支离破碎,研究范围也过于狭窄。金融学理论体系支离破碎的首要表现,就是它缺乏支撑整个理论体系的统一的基础理论。金融学迄今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当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以及其他有势力的经济学派(如新制度经济学派),就不可能不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具有不同的范式基础和基本理论框架,各经济学派在研究金融问题时自然会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结论。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完全灵活价格和理性预期的假设,有力地支持着金融自由化的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则强调市场机制的不完全性,主张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加以适度的管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理论的触角进一步延伸至金融领域,着重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对金融的影响。又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得出了“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则进一步否认了货币冲击对经济的实质性影响,从而使货币外生化;新凯恩斯主义则通过粘性价格理论证明,货币仍然是非中性的。这样,各种经济学派衍生出的金融学理论观点因此相互分立,甚至相互矛盾,致使当代金融学严重缺乏统一、连贯的体系。支离破碎的理论体系,使金融学发展整体上停滞不前,难以实现新的超越,金融学只能在个别问题、个别现象和个别时期内有限地解释现实和发挥指导作用。

金融学体系的支离破碎,还表现在金融学微观基础的庞杂与宏观机制的纷乱。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革命”的产物,迄今已经发展得比较完整。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缺乏合理、稳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各流派经济学都在努力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和建立微观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其成效仍然是有限的。宏、微观经济学之间缺乏逻辑顺畅的连接,必然使分别建立在各经济学流派基础之上的当代金融学体系在宏、微观上相隔离,一方面造成微观金融学在模型演绎中完美无缺,而在实践中往往形成集合谬误,例如“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被赞颂为“20世纪金融领域的重大发现”;两位经济学家并被授予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由他们领导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LTC)并没有避免投机失败直到破产的命运。另一方面,宏观金融学虽然已经发展出从货币银行到国际金融等众多理论,但是由于微观基础的缺失,其对经济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关联很难从全面的角度展开分析,这就使宏观金融学转换为政策时屡屡南辕北辙。

从当代金融学的研究范围来看,目前传统的货币银行理论仍然是其重心。货币银行理论包括货币理论和银行理论两个部分。其中,货币理论涉及货币的本质或价值决定、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它主要是宏观理论,因此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完整地包含这些内容;银行理论则主要探讨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金融活动微观主体的行为以及金融市场的运行和监督管理等问题,它是侧重微观的,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此外,60年代产生的金融发展理论虽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问题的,但是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进

行,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些理论命题、原理和结论也反映到传统的货币银行理论里,因此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论也成为金融学考察的内容。

但是,金融现实的发展远比理论的演变和完善快得多,当代金融学所包括的研究范围已经完全不足以涵盖当今的经济、金融现状,从而产生了至少如下理论缺失或不足:

其一,传统上,在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上,普遍把金融的功能定义在经济运行的中介上。就经济和金融活动发展的早期而言,这种认识是恰当的和实事求是的。但是战后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经济、金融的迅速发展表明,在经济金融量的急剧增长的同时,经济金融本身的属性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传统认识已经越来越无法有效地解释许多经济和金融现象。其间,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尝试重新考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如60、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提出,就是把金融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之中,把金融作为一个影响(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来看待,从而为突破这种传统认识提供了契机。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先后提出过托宾模型、粘性价格模型及其财富效应等,证明金融活动对经济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由于经济学忙于在基础理论层次上的学派更替,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时至今日仍没有更大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的重新评价和定位上,当代金融学如果是一片空白,也是极为有限的。这就造成金融学完全沉浸于对金融本身的探讨,而无力或不愿去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这一金融学的归宿问题。然而,缺少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明确认识,金融学对金融问题本身的考察也不可能是完整、有效的。

其二,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日新月异中,金融某种程度日益脱离实际经济而运行的“虚拟”现象日渐突出。金融的“虚拟”化,不但对实际经济产生了新的影响,而且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金融自身的运行特点。当代金融学在诸如金融工程、衍生金融商品市场等微观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显然对金融的“虚拟”现象缺乏整体性反映。因此,当代金融学结构中,至少缺少了对新形势下新问题的关注:一是“虚拟”的金融对一般经济的影响,一是“虚拟”金融自身的运作规律和发展趋势。

其三,经济全球化之下,国际金融和各国金融运行及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原先在一国或一类国家中有效的金融运行和发展规律,目前则往往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不适应性。当代金融学对此方面的研究尚处萌芽状态。

最后,当代金融学忽视发达国家之外的金融发展问题也是其理论结构的严重不足。60、70年代,以金融结构理论、金融压抑和深化理论为代表的发展金融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这些理论为指导,在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市场化金融机制的引入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是,发展金融学没有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发展中国家内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发展,理论滞后严重。特别是,除了大量发展中国家之外,目前世界还有数十个原计划经济国家处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这些国家特殊金融问题的研究,当代金融学基本上如果不是一片空白,也是极为有限的。

3. 当代金融学的分析方法有失偏颇。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受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因此,如同一般经济学一样,当代金融学越来越严重依赖于数学工具,一个不用数学公式表达的金融学模型很难得到认同,以至于“伟大”的金融学家们不得不频频从数学家中间产生。数学的应用固然有利于金融学在逻辑上的严整性,也有助于金融学理论结论付诸实际操作。但是,经济、金融活动过程总是结合了政治、文化、社会和个人心理等多重因素的作用,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难以完全用数学描述清楚,而且用测度确定性的数学工具去考察作为人的主观行为不确定结果的市场,本身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此外,如上所述,金融学的形成和发展,是经济学学科分

工细化的结果。因为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全知全能的集大成者已经很难出现,而且分工细化有助于研究效率的提高。但是,经济学各学科分工的细化在提高了经济研究效率的同时,也造成学科间壁垒森严,分割严重,不同学科的经济学家沉湎于自己的领地,很少超越,因而形成了顽固的孤立主义研究传统。金融学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很少从其他学科吸取。然而,现实中金融与一般经济的渗透与融合是极为广泛和深入的。因此,这反过来制约了经济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这种传统也大大束缚着金融学的解释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总之,当代金融学的上述矛盾和问题实际上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在范式对立的情况下,金融学理论体系不可能完整;体系的支离破碎,又阻碍着金融学范式的统一;而分析方法的偏颇又使金融学不得不回避某些它本应顾及的现实问题。当然,客观地说我们并不能否认当代金融学仍然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但就理论、范式及方法这一整体而言,当代金融学是处于困境中的,急需全面梳理和重构。

四、结语

既然金融学的重构任务如此紧迫,在此我们本应给出重构的对策。但是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金融学要实现重构必须在范式、理论和方法三个方面全面进行,而金融学的范式、理论和方法又严重地依赖于一般经济学的发展变化,因此金融学的重构不可能单兵独进。

以经济学发展史显示的规律来看,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共存和对峙,反映了经济学本身处于一个分裂的时代。分久必合,当代经济学进行博采众长的综合是下一步的必然发展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已经逐渐显露。这必然预示着金融学将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取得新的突破,并决定着金融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积极把握和适应这种趋势,对于金融理论工作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2卷,34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马克思认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即是重商主义。”见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此文据称是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

早在《通论》中,凯恩斯就关注了预期问题,不过在凯恩斯那里人们的预期是非理性的外推型预期。以后,弗里德曼提出了适应性预期,到理性预期学派又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从外推型预期到适应性预期再到理性预期,暗含着对人的理性程度及预期能力的很大不同。

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那里,价格是完全没有弹性的,这也是它们坚信自由市场机制能够持续、迅速出清的前提和关键,而凯恩斯的《通论》则假设,价格是刚性的。可见,新凯恩斯主义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手法。

在有的文献中,新制度经济学是由若干理论、方法不同甚至相对的派别构成的,包括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的思想和理论,但是它们更接近于传统的制度经济学,因此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指罗纳德·科斯所创立的关于产权、经济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理论体系。

比如,从1776年《国富论》发表从而创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到1870年边际革命奠定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近100年;从边际革命到1936年凯恩斯革命,经历了近60年;而从凯恩斯革命到70年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兴起不过只经历了30多年。

或者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演变形成的市场经济、金融制度是大体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问题尚没有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当然也包括非系统性风险,但非系统性风险理论上是可以消除或避免的。

10 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12 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145、1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 沈阳 110000)

(责任编辑: 曾国安)